国民性、德国中心论、种族与纳粹时代的德国音乐学

——帕米拉·波特《最德国的艺术：从魏玛共和国到希特勒第三帝国灭亡的音乐学与社会》述评

宫宏宇

内容提要：有关纳粹统治期间德国音乐学的研究虽然始于上世纪70年代，但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学界重视，美国学者帕米拉·波特是为数不多的致力于此课题的学者。本文重点介绍她的专著《最德国的艺术：从魏玛共和国到希特勒第三帝国灭亡的音乐学与社会》，同时也提及她近期的一些论著，旨在引起国内学人对这段历史的兴趣，以全面了解音乐学与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和音乐学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帕米拉·波特；音乐学；纳粹；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社会；历史连续性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09)02-0123-06

谈起音乐学，当今学界更多提到的是德国音乐学家对这一学科的贡献。从1829年J.B.罗基尔首次使用音乐学这一名词，到1863年F.克里桑德在《音乐学年鉴》前言中对这门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进行的较详细的论述；从阿多诺冷战后对瓦格纳的批判和对以勋伯格为代表的现代音乐的诠释，到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20世纪下半叶有关欧洲音乐－特别是对以19世纪德国、奥地利为主的古典音乐－百科全书式的论著和深邃的历史学理论，可以说没有德国学者就没有音乐学这一学科。由于德国音乐学家在音乐学创建和发展上所做的突出贡献，大家对他们崇敬多于批评。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德国音乐学者在纳粹党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或不予理睬或轻描淡写。美国学者帕米拉·波特（Pamela M. Potter）是少数几个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纳粹执政时期德国音乐学状况的学者，1998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她的专著《最德国的艺术：从魏玛共和国到希特勒第三帝国灭亡的音乐学与社会》（以下简称《最德国的艺术》）可说是作者多年来研究集大成者，其中所涉及的人虽大多为世界音乐学界权威，但其在纳粹统治期间的所作所为却一直是学界不愿深究的话题，因而不为世人所知。

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音乐学院和德文系教授的帕米拉·波特早年就学于哈佛，毕业后曾两度赴德国留学。她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耶鲁读的。她的指导老师是曾任耶鲁、伦敦大学音乐学教授，现任牛津大学讲座教授的著名音乐学家瑞哈德·斯托姆（Reinhard Strohm）。斯托姆生于德国慕尼黑，在柏林时曾师从达尔豪斯攻读博士，波特主要的研究领域为

收稿日期：2008-11-18

作者简介：宫宏宇（1963-），男，现任教于新西兰国立UNITEC理工学院语言研究系；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特级研究员。

20世纪上半叶德国音乐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音乐学史研究方面用力尤深。1991年她在耶鲁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为“1918~1945年德国音乐学的研究趋势:方法论、意识形态和机构变迁对音乐史写作的影响”(Potter, 1991),《最德国的艺术》就是在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详细查证保存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有关的档案改写而成的。

《最德国的艺术》虽然包含纳粹执政下的音乐学研究状况与发展历程的详细叙述,但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考证性音乐断代史书,也不是一本从技术的角度论证分析第三帝国统治下的音乐学状况的专题性研究。而是一本从社会学和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特定时段德国音乐学的专著。波特在引言中很明确地声明,她所要达到特定的目的有两个:一、在自己以前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揭示音乐学与国家、政党和德国人民所维系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进一步扩展学术视野(p. xv);二、通过考察1918年到1950年(而不是仅仅聚焦纳粹时代)的德国音乐学来阐明从魏玛共和国时代(1919~1933)到希特勒第三帝国(1933~1945)所存在的连续性(p. xvi)。为了到达第二个目的,本书有意识地用论题式的方式,而不是按照年月顺序来组织各章节(p. xvi)。本书虽然不缺乏对纳粹统治下的音乐学大事件的梳理介绍,但总体来说,作者所关注的焦点是纳粹统治下德国音乐学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其所依附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50年代初32年间德国音乐学家学术生涯的审视和对德国音乐学术机构变更的详细追溯也表明作者对音乐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关注远过于她对音乐形态分析的兴趣。此书虽然出自音乐学家之手,是为音乐学家所著,但其采用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多来自音乐思想史和社会学研究领域。这也是为什么此书出版后,有关此书的评论不仅出现在《音乐与文学》、《美国音乐学会会刊》等专业音乐学期刊,而且还出现在《中欧历史》、《加拿大历史学刊》、《美国史学评论》、《跨学科犹太学研究期刊》、《德国研究评论》等人文刊物。

除了序、目录、鸣谢等外,本书共有八章364页。第一章除对魏玛共和国时代和希特勒时代德国的音乐与社会情况予以概述外,还概括地综述了目前有关一次世界大战后音乐在德国社会所扮演的不断变化的角色的研究现状,为以下各章节条分缕析提供背景知识。此外,波特还提到了魏玛共和国时代专业音乐活动(如音乐机构、音乐学家、音乐学科等)和战后兴起的德国业余的社会性的大众音乐文化情况,如民间的合唱协会、青年歌咏活动、大众音乐教育活动等,为印证全书所要论证的魏玛共和国–希特勒第三帝国–二战后之间存在“连续性”的主题做了铺垫。第二章(“音乐学家论自身在现代德国社会中的作用”)具体地叙述德国音乐学者在大学校外所从事的直接与社会有关的音乐活动,如担当乐评人、编辑普及性音乐书刊、参加社会上的演奏活动、指挥业余合唱团、从事艺术管理、充当音乐指导、从事国民音乐教育等。音乐学界人士对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不仅大大缩短了音乐学研究、学界与德国民众生活间的距离,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在德国社会的影响力。作为受过专门训练的音乐权威人士,他们的言语有相当的分量,对社会的影响极大。如他们对德国古典音乐遗产的民族主义式(甚至种族主义式)的理解和宣传,他们对德国民歌传统和公众音乐活动的重视等都直接影响了德国民众的音乐文化观。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所表现出的特殊功用预示了他们将在第三帝国统治期间所扮演重要的角色。作者还特别通过著名音乐学家布鲁默(Friedrick Blume, 1893~1975)的案例,来进一步展示她所强调的“连续性”。布鲁默从魏玛时代起就颇享盛名,纳粹统治时期他的职位与影响没有任何改变,希特勒倒台后他依然是音乐学界的“不倒翁”。虽然他是在1938年德国第一次全国音乐学会议上公开以“音乐与人种”发言的音乐学家,但1945年后,作为德国新的全国音乐学家学会的创立者和大型辞书《音乐的过去和现在》(MGG)的主编者,他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如日中天,1958年还被选为国际音乐学会的主席。这里波特不只是简单地谴责纳粹德国音乐家的机会主义倾向,而是从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气候、个人企图等多重视角来展示特定情况下特定个人所作出的抉择。

第三章从音乐学家所担当的社会角色转而专论纳粹期间的音乐学研究机构,作者通过考

察位于巴克堡(Bückeburg)的"皇家音乐学研究所"和后来改名为"德意志音乐科学协会"的"德意志音乐协会"在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时代的变迁又一次证明了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第三帝国之间在音乐学机构的设立上所存在的"连续性"。纳粹党执政后,不仅和魏玛政府一样继续扶植德国音乐,而且在财政上、组织结构上支持音乐学这一"最德国的艺术",其目的是突出音乐艺术的德国民族特性,剔除音乐中所谓的外来的"有害因素",如瓦格纳所断言的"犹太"因素、以勋伯格为代表的现代音乐因素、美国黑人爵士乐因素和苏联布尔什维克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波特通过对比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统治下的音乐学界令人信服地表明德国音乐学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希特勒掌权的既得利益者。希特勒上台前,德国音乐学界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作为一个新学科,音乐学在德国大学中的合法地位尚未完全稳定,音乐学者的学术地位也常常被质疑。一战后,德国学人旅游的自由受到限制,直接影响了德国学界与世界学界的交流。战败后的德国财政空虚,学界研究经费的缺乏使得一些音乐学研究项目无法展开。教职和研究机构的短缺使得大批从前线归来的学人发挥不了所学的专长,就业问题直接牵涉到了音乐学界人士的生存问题。从1918年一战结束到1932年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只有八所大学任命了全职音乐学教授,大量有博士学位的音乐学学者找不到固定工作,失业的苦痛加上通货的膨胀使得学界人士忧心忡忡。但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纳粹领导人(如希姆莱、戈培尔等)对德国音乐文化遗产的关注使得音乐学研究再次得到重视。一些对纳粹有利的音乐学研究项目得到政府的慷慨资助,魏玛共和国时代由于财政问题而不得不暂时停顿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得以恢复。"皇家音乐学研究所"就是由纳粹政府直接插手恢复的。旧机构的恢复和新机构的建立无疑为战后就业难的德国音乐学者提供了机会,但同时也引发了人际间的一些矛盾。波特通过对档案材料仔细的搜索披露出了一些非常引人入胜的细节(如这些机构设立期间音乐学家为利益所驱,明争暗斗、互搞小动作等)。这些细节对我们打破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对德国音乐学者近乎顶礼膜拜的现象很有帮助。

第四章把研究的焦点从机构转向德国音乐学界,具体讨论纳粹统治下德国大学的音乐学发展情况。此章虽然是综述,但也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细节,如1933年后德国各大学中开设的与音乐学有关的课程;1918~1945年间德国各大学音乐学科系的变迁;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大学的纳粹化过程以及当时推行的极端的种族政策对大学内音乐学研究理念的影响等。纳粹政府的排犹政策使得大批有成就的犹太裔音乐学家(如Curt Sachs, Alfred Einstein, Karl Geiringer, Manfred Bukofzer, Leo Schrade)被迫放弃教职,远走他乡。他们的离去虽然削弱了德国音乐学研究的实力,但也缓解了年轻音乐学家就业难的问题。这些细节不仅为作者所提出的一些德国音乐学者是纳粹当政的受益者的论点再一次提供了佐证,也驳斥了学界所流行的第三帝国没有音乐文化的看法。

第五章就纳粹统治下的音乐学研究项目和规划的具体实施(如纳粹党卫队发起的"祖先遗产"项目)展开讨论。波特通过对纳粹政府和德国音乐学家在这些具体项目的实际实施方面所表现出的复杂且密切的关系重申音乐学家是希特勒掌权的既得利益者的论点。虽然关注德国民间音乐并非纳粹时代所独有的现象,但纳粹党的确对德国音乐学家探求之根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出于意识形态和宣传的目的纳粹党对德国本土音乐根源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纳粹党人对德国民间音乐的重视不但为从事民间音乐研究的德国音乐学专业人士提供了用武之地,还为他们提供了研究所必需的经费。同时,德国对邻国的扩张也为德国音乐学家开展田野工作和材料搜集(曲谱、乐器、手稿等)工作提供了方便。通过研究费理茨·鲍斯(Fritz Bose)、汉斯·茅瑟尔(Hans Joachim Moser)、阿尔费理德·宽尔玛茨(Alfred Quellmalz)等在波兰等被德国侵占的领土上所开展的具有明显帝国主义侵略色彩的民间音乐研究项目,波特令人信服地证明德国音乐学家与纳粹政权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一种被命令者与发令者的简单关系,而是一种互惠互利的组合。作为纳粹文化政策的实施者,德国音乐学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积极配合了纳粹第三帝国推行的侵略政策。

第六章("新方法论的形成")以微观的视角关注德国音乐学家当时所注重的音乐学方法。其焦点虽是由纳粹意识形态决定的以人种为中心的方法论,但其中也包含一段对20世纪初期音乐学研究趋向的综述。德国音乐学研究中的反犹太主义倾向,早在瓦格纳的著述中已经初见端倪(关于瓦格纳的反犹言行及其实质,可参见Marc A. Weiner, *Richard Wagner and the Anti-Semitic Imagination*,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但人种决定论真正成为一种由当权者直接倡导的权利话语还是在纳粹统治期间。第七章("在音乐中界定'德国性'的尝试")讨论德国音乐的本质、音乐与德国国民性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其中所涉及的国粹问题的讨论,与我国二三十年代类似的讨论与实践很有可比性。什么是德国特性?音乐德国性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音乐代表德国民族性?如何在音乐中找出德国民族性?对亨德尔这样一个出生在德国但长期在英国发展的作曲家该如何定位等都是音乐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最后一章描述纳粹政府倒台后德国音乐界进行的所谓"非纳粹化"过程。波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是第三帝国体制下的德国音乐学从来就没有真正"纳粹化(nazified)"过,因此也就谈不上"去纳粹化(denazified)"问题。战后的所谓"去纳粹化"不仅没有完全抹去纳粹的影响(如纳粹期间活跃的音乐学家继续活跃,一些纳粹期间进行的学术项目继续进行),而且掩盖了纳粹期间音乐学家所作所为的深层思想根源(p. 262)。

近年来有关纳粹德国的音乐问题已经有专著多部(Kater, 1992, 1997, 2000),但像波特这样专注于德国音乐学领域的著述并不多。无论是从德国音乐学发展的总体角度来看,还是从纳粹执政下音乐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来讲,波特的书都无疑填补了目前音乐学研究的一个空白。但她最宝贵的贡献还是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长期以来,学界谈到纳粹时期的德国音乐时,更多关注的是决定谁有罪无罪的问题,如对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卡尔·奥夫(Carl Orff)、汉斯·菲特兹纳(Hans Pfitzner)、指挥家威尔汗姆·福特温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卡拉扬、歌唱家伊丽莎白·史瓦考夫(Elisabeth Schwarzkopf)等与纳粹的合作的讨论。在这点上很类似我们文革后对于所谓"三种人"的清算。当涉及到第三帝国统治期间的德国音乐学家时则多注重受纳粹迫害被迫离开德国的犹太音乐学家,以及他们对美国音乐学建立的功绩,如著名乐器学家柯特·萨克斯(Curt Sachs)。对于留在德国的音乐学界家在第三帝国统治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学界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虽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有少数美国学者对此课题注目(Ellis, 1970, Meyer, 1970),但在德国类似的研究直到80年代初期才起步,且受到人为的阻力。即使是美国早期的研究,所聚焦的也只是纳粹执政的十多年(Myer, 1975, 1978)。波特认为,对于德国音乐学者在纳粹期间的所作所为,不应该孤立地把它看作是仅仅局限于纳粹当政时所产生的现象来看,更不应该把这期间德国音乐学的发展称为"纳粹音乐学"(Potter, 1996: 72)。她指出德国音乐学者与纳粹政权的合作,不应简单地理解为是他们迫于强权政治的压力,不得已在学术上作出的妥协,政治决定学术。与其把罪过统统转嫁于纳粹政府,把学者描绘成游弋在政治之外的无辜的受害者,波特更希望展示给读者另一幅多层次、多色彩的图画:那就是一些音乐学者是如何有效地利用纳粹政府所提供的机会来寻求自身利益的,他们的研究活动又是如何与纳粹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反犹太人政策相配合的。在波特的笔下,纳粹期间活跃的音乐学者与纳粹政府的关系不是命令者与被命令者的关系,他们与纳粹政府的妥协合作方式(有些学者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说是助纣为虐)也是多种多样,其潜在的原因也不尽相同。而这种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术为自身牟利、学术为实现个人企图的趋向也不始自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而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时代找起。音乐学为政治服务、音乐学研究为种族优越性提供理论依据的趋向并没有随着第三帝国的灭亡而消失,由于当事人的存在,以及他们在世界音乐学界的显赫地位,学界仍难完全摆脱这种研究观念的影响。德国学界不说,就连包括美国的音乐学术界也不例外。这也是她此书的中心命题。

波特利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很令人信服地

论证了为纳粹服务的德国音乐学家所倡导的很多理念是与纳粹推行的政策分不开的,很多甚至是直接为第三帝国服务的。纳粹统治无疑是德国史上最黑暗的年月,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有深厚哲学传统、以独立思维为特征的德国民族为什么会如此盲从,重学术独立的德国音乐学者又何以如此背叛自己的理念?波特的回答对我们打破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对德国音乐学家及其学术成就顶礼膜拜的现象极为有益。首先,波特通过对德国音乐学界一次世界大战后面临的危机的分析来凸显纳粹政府和音乐学者间的利益关系。其次,波特从纳粹所盛行的方法论、民间音乐研究、德国国民性的讨论等视角具体地讨论了音乐学家与纳粹政府的合作关系。相对与其他学科,音乐学在一战后的德国是个新兴的学科,在学术界的地位尚未确立,音乐学者处于学界的边缘。纳粹党的上台为音乐学成为学界主流和音乐学者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机会。具体的来讲,是纳粹党所倡导的极端民族主义为音乐学者提供了用武之地,使他们可以专注于对德国民族性的研究。纳粹政府所奉行的排犹主义使得大批的犹太学者被逐,造成大学和研究院职位的空缺,这为战后归来的音乐学者和一直找不到教职的刚刚毕业的博士生们提供了机会。从纳粹政府的角度来分析,德国音乐在当政者眼里是最具有德国特性的艺术,德国音乐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为他们宣传德国种族优越性提供了最好的宣传工具。瓦格纳、理查德·施特劳斯等的音乐可以从创作的角度向世界展示德国作曲家的独创性,德国音乐学家的学术研究则可以从理论上向世界证明德国音乐的优越性。有些学者刻意讨好纳粹政府,为了配合纳粹政府的种族政策,在纳粹党上台不久,一些音乐学家就又重新开始使用早在20年代就被学界抛弃的以种族论为中心的伪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要证明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犹太人的劣等性。波特的书对纳粹当政期间的音乐学界人士的所作所为批评明显多于赞扬。她在书中剖露,和其他领域的学者相比,一些著名的德国音乐学家(其中一些在纳粹倒台后仍然很活跃,甚至多年来一直是世界音乐学界的权威人物)对纳粹党的支持上要积极得多。他们除了通过夸大德国丰富的音乐遗产在意识形态上为纳粹营造声势外,还利用一些政治上有利的研究课题来争取研究基金,对二次大战德国占领和兼并的国家和地区所保存的珍贵的音乐资料进行掠夺。但作为局外人,她能平心静气的用史实说话(她的论述基于大量的私人文件记录、档案材料、不常见的出版物)。有的书评提到这样坦诚的、不为尊者讳的书可能只有美国人写得出来(Hailey, 1999: 108)。有学者甚至评论说,波特此书最宝贵的贡献是她对著名音乐学家,如海尼克·贝斯勒(Heinrich Besseler)、布鲁默、汉斯·茅瑟尔(Hans Joachim Moser)、约瑟夫·穆勒勃兰葡(Joseph Müller-Blatteau)等学术生涯的批判性审思(Levitz, 2002: 176–177)。

除了对纳粹期间德国音乐学家的所作所为公正的评判外,波特所提出的另外一些问题也很发人深省。如纳粹党有没有完善的音乐政策问题,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等主要纳粹领导人对音乐的干预及干涉的程度问题,纳粹期间音乐文化的总体的发展问题,纳粹对现代音乐的态度问题等。针对以往研究存在的简单化倾向(如认为被迫逃亡的音乐家多数是好的,留在德国大多值得怀疑),波特都根据史实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对我来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展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对其文化的反思,特别是第七章中有关音乐与"国粹"的讨论和"音乐救国论"思潮的兴起。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使得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怀疑,认为国家衰弱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的问题,而音乐是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振兴真正的德国音乐是医治德国病根的良药。有意思的是,就在1923年王光祈倡导礼乐复兴的同时,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汉斯·茅瑟尔也提出要解决"德国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的是"音乐问题"。和王光祈一样,茅瑟尔认为音乐问题解决了,其他一切由科技和资本主义所引起的问题(如"黑人化的问题""美国化的问题""现代性的无根问题"等)都会迎刃而解。

除了《最德国的艺术》外,波特还和别人合编过《音乐与德国民族性》一书(Potter & Applegate, 2002)。她近来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德国音乐话语中的种族概念》(2007)、

《犹太音乐与德国科学》(2007)、《德国在美国的音乐影响》(2004)、《第三帝国的音乐:“德国化”任务的复杂性》(2004)、《从魏玛到希特勒的柏林音乐生活》(2003)等。她发表在美国《音乐季刊》上的《亨得尔清唱剧在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德国民主共和国初期的政治化》(2001)、《何谓“纳粹音乐”?》(2005)和她较早期发表在《美国音乐学会期刊》上的《希特勒统治下的音乐学:语境下的新史料》(1996)等论文尤其值得参考。

参考文献:

Ellis, Donald Wesley

1970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ational Socialist Aesthetic Theory as Governmental Policy”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Kansas).

Hailey, Christopher

1999 “Book review,” *Notes*, 56 (1): 106－109.

Levitz, Tamara

2002 “Book Review”,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55 (1): 176－187.

Kater, Michael

1992 *Different Drummers: Jazz in the Culture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The Twisted Muse: Musicians and Their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omposers of the Nazi Era: Eight Portrait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ter, Michael & Albrecht Riethmúller eds

2001 *Music and Nazism: Art under Tyranny, 1933－1945*. (Laaber: Laaber).

Myer, Michael

1970 “Assump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zi Policy Toward Music” (Ph. D. diss., UCLA).

1975 “The Nazi Musicologist as Myth-Makers in the Third Rei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0: 649－665.

1978 “Musicology in the Third Reich: A Gap in Historical Studies,”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8: 349－64.

Potter, Pamela M.

1991 “Trends in German Musicology, 1918－1945: The Effects of methodological, 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on the Writing of Music History”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5 “Did Himmler Really Like Gregorian Chant? The SS and Musicological Research,” *Modernism/Modernity*, 2 (3): 45－68.

1996 “Musicology under Hitler: New Sources in Contex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49 (1): 70－113.

1998 *Most German of the Arts: Musicology and Society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End of Hitler's Reich*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The Politicization of Handel's Oratorio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The Musical Quarterly* 85 (2): 311－341.

2003 “Musical Life in Berlin from Weimar to Hitler” in Michael H. Kater and Albrecht Riethmuller, eds. *Music and Nazism* (Laaber Verlag).

2004 “German Musical Influ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etlerf Unker,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1945～1968: A Handb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 1.

2005 2005“What is ‘Nazi Music’”, *The Musical Quarterly*, 88 (3): 428－455.

2007 “Jewish Music and German Science” in Philip V. Bohlman, ed., *Jewish Musical Modernism, Old and Ne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The Concept of Race in German Musical Discourse” in Julie Brown ed., *Western Music and Rac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Dismantling a Dystopia: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0 (4): 623－651.

Potter, Pamela M & Celia Applegate

2002 *Music an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s of atonal music's deeper structure. The article makes an textbook-like interpretation of its nature and application, out of which its effective analysis can be produced.

Out of Way: Notes on Prof. Zhao Xiaosheng's Lessons (II) –Close Reading of Chopin's Sonata No. 3 /HOU Yingjun (78)

The essay reveals in a poetic language the transcendent experience in Chopin's innermost being with his Sonata in B minor No. 3, involving part of its three movements.

On Zhao Songguang' New Solm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 Education /ZHAN Yanjun (87)

Promoted by Zhao Songguang in *The Art of Music* (1985), the *Sanzhou xiechang* (change in three axes) solmization is further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he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 education.

Thoughts/Ideas

Reflections and Blueprints Chines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Ethnomusicology (II) /LUO Qin (93)

The essay analyzes the experiences of ethnomusicology both in the West and in China, suggesting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discipline in China be focused on definite academic thoughts and deepen Chinese practice and explore Chinese experience on the basis of a smooth operation and a constructive framework. The blueprints are introduced, surrounding the target of "Ethnomusicology in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a proposal by the E-Academy of Ethnomusicology and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Chinese Ritual Music. With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of music in mind, the author attempts to form a skeleton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Shanghai music history and culture.

National Character, German-Centrism, Race and German Musicology in Nazi Times-On Pamela M. Potter's *Most German of the Arts: Musicology and Society from the Weinar Republic to the End of Hitler's Reich* /GONG Hongyu (123)

The introduction to Pamela M. Potter's book aims to arouse our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in order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musicology and politics, as well as a peculiar proc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On Ji Kang's *Sheng-wu-ai-le-lun* in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Psychology /CHEN Jing-e (129)

Musical aesthetic experience as reflected in Ji Kang's *Towards a Music without Sadness and Happiness* is discussed here. The writer argues that to some extent the "harmony" in Ji Kang's statement "music is based on peace and harmony" reflects a mediated stance between autonomy and heteronomy, revealing that Ji Kang's musical concept is no lack of empiricism.

Reminiscences/Recollections

Obituary Tributes to Prof. Chen Mingzhi

Counterpoint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 Retrospective Account of Chen Mingzhi's Academic Achievments /XU Mengdong (146)

A Posthumous Gratitude to My Mentor /LIN Hua (152)

A Survey of Chen Mingzhi's Academic Career in Polyphony /YE Sinin (156)